

全国多地发消费券之后的市场观察

北京市发放“绿色节能消费券”，每份券包总金额1500元，可购买符合条件的21类绿色节能产品；成都市发放数字人民币线上消费券，金额共计1.6亿元；太原市投放5类22种数字消费券，财政总投入4.2亿元……近期，全国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，提振消费市场活力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消费券能提振消费，不过，为更好发挥其作用，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流程。

消费券努力促进消费恢复

国务院办公厅4月25日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》，要求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，促进消费持续恢复，并提出5方面20条政策举措。

发放消费券是各地出台的促消费手段之一。从涉及品类来看，除了受疫情影响的餐饮、文旅、娱乐等行业之外，有不少省份和城市开始发放汽车消费券，如山东拟投入资金5亿元，发放汽车消费券15万张；还有一些则是与当地的支柱产业相关，如广东佛山发放针对家电产品的消费券。

“政府出资，平台支持，商户配合。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程介绍说，消费券一般是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，然后跟互联网企业或者电商平台合作进行线上发放，部分平台还会给予配套补贴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今年各地的消费券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信小程序和各类互联网App发放，派券方式包括定时抢券、摇号和抽奖等。合作的第三方商业平台主要包括微信、支付宝、京东及美团等。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伏娥表示，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代表的支付类平台的特点在于消费

端覆盖面更广；而美团作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，则与线下实体商户联系更加紧密。
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金服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政府1元的消费补贴能够带动平均3.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。不少地方和支付平台统计的杠杆效应可达到5倍甚至10倍的效果。

微信平台的数据显示，2020至2021年微信支付实际核销各类优惠金额229亿元，撬动社会消费5200亿元。以宁夏银川为例，自今年3月初至6月6日，已发放13轮政府消费券，参与人数260万，在线核销超过55.7万笔，直接交易额1.5亿元，间接带动消费19亿元。

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，发放餐饮、住宿、旅游、汽车等不同品类的消费券，既能达到定向帮扶特定行业的效果，也能吸引商家和企业推出更多个性化的让利优惠，进而带动上下游复苏，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，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良性循环。

发放、使用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

记者调查发现，一些地方的消费券，在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——线上发放，一些年龄大的消费者很难抢到。一些年龄偏大的消费者反映，虽然消费券“红包”很多，但能抢到的很少，因为目前消费券一般采用线上发放模式，价值高的几秒就抢光；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没有年轻人熟悉，对各种手机App推送的信息也很难及时关注到，即便关注到了，抢券手速也没有年轻人快。

——一些消费券使用规则不完善。深

圳某网友在某购物平台上购买了价值2899元的手机并使用了消费券，之后因个人原因申请退款想重买，但是退款后消费券平台不予以退回。“辛辛苦苦抢来的消费券算是白抢了。”在黑猫投诉平台上，还有不少人反映同样的问题。

“我抢了美食券来消费，但是在火锅店结账时服务员说，锅底费用、茶位费用、饮料费用都不能计算在内。”广州的刘女士告诉记者，本来算好了满400元正好可用券，但是结算时才发现不能用券的那部分费用都七八十元了，商家说有自主解释权。

——一些消费券被交易、转卖。记者调查发现，有人利用外挂程序等抢消费券，还有人通过虚拟定位在其他城市抢券，然后倒卖。某二手平台出现了售卖消费券的现象，部分人以“代付”方式向真正消费的顾客折价出售抢到的消费券。

记者在广州市北京路商圈看到一家土菜馆消费火爆，一些正在等位的市民朋友告诉记者，这家店可以用消费券，“没有抢到消费券也没有关系，拍下座位号后微信发给‘黄牛’，由他们来结账。”而通过“黄牛”结账比直接使用消费券多付10元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认为，出现消费券转让、交易甚至套现，有的可能是设计机制本身有漏洞，可通过技术手段解决问题；如果是大规模、团伙式转卖，则不仅会破坏市场秩序，还会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，可以用行政、法律手段去处理。

精准发力放大消费券效用

受访专家表示，消费券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让政府补贴变为“助燃剂”，在短时间内激发消费规模增长，最终传导到生产供给

侧，带动整个经济链条复苏。如何发挥好消费券的作用，还需要从多个维度精准发力。

曾伏娥认为，为了实现短时间内激发消费规模增长，政府的目标人群应该是那些低收入或者受疫情影响的消费者。“可以分批次在多平台发放，根据核销率动态决定下一批次消费券的投放，提升消费券发放和使用效率；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实时追踪发放效果，不断改善投放方式，从而更加精准地将消费券给到有需要的人手里。”

“发放消费券不妨线上为主、线下为辅。”孙亚程建议，可以发放一些纸质消费券作为补充，比如与当地部分商场、超市、便利店等线下场地联合，给特定群体定向发放一些消费券。

沈艳认为，可以把央行的数字人民币与消费券搭配，保证资金能实现定向定期的使用。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，还要加快发展新兴消费、绿色消费，这有利于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。目前北京、郑州等地已相继发放绿色节能消费券，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节能商品。

曾伏娥建议，政府可以对消费券的金额和使用频率进行限制，加强大数据分析，加强对非正常交易记录的筛查，通过技术手段尽量避免以虚假交易套现行为，真正让消费券成为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的“助燃剂”。

此外，记者了解到，近期出现的倒卖、套现消费券等现象，已引起公安机关注意，相信陆续会采取措施对主观恶性较大、投机牟利、大量恶意套现等违规使用消费券的行为进行打击。

新华社记者 胡林果 吴文诒 杨稳玺（参与采写：孙彤）

器官捐献协调员：在生死之间摆渡

在病房门口，一位6岁脑肿瘤患儿的母亲问患儿：“有很多小朋友需要眼睛，如果你以后变成小星星了，你愿不愿意把眼睛给他们？”
“只有陪伴着家属，与他们共同经历困难、共同解决问题，才能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，他们才愿意把亲人身体的一部分托付给我们。”

“你愿意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病人的生命吗？”

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第4年，这句话慢慢成了郑冰莹的口头禅。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联合OPO（人体器官获取组织）的她，每天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“为生者寻找希望，为逝者延续生命价值”。

今年6月11日是我国第六个器官捐献日。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6月6日，我国历年累计器官捐献人数达40200人，器官个数121024个。
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数万献出“生命礼物”的逝者，以及那些四处奔波的“生命摆渡人”——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

ICU，是郑冰莹最常出现的地方。这里有冰冷的数字和仪器，惴惴不安的家属，以及随时可能离开的病人。

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，就是从病人中寻找可能的供体，为患者带去移植希望。

据统计，中国每年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器官移植，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。

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，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最重要的使命。通常他们需要协助完成意愿征询、脑死亡判定、器官捐献、伦理审查等一系列工作。

“协调员常常面临两方面压力：一是等待的病人，许多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的机会；二是捐献者家庭，中国人‘入土为安’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对尚在悲痛中的家属提出捐献，难以开口。”郑冰莹坦言。

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6岁的脑肿瘤患者——医生说，孩子只剩一年半的时间，妈妈不想放弃，带着女儿四处求医，但是看着病友群中的小朋友一个个离开，妈妈最终还是找到协调员，希望给孩子一个“最好的归宿”。

“有很多小朋友需要眼睛，如果你以后

变成小星星了，你愿不愿意把眼睛给他们？”在病房门口，母女俩的对话至今让郑冰莹动容。

郑冰莹说，最终，逝者留下肝、肾、眼角膜，为5个孩子带去了希望，但妈妈却难以走出悲痛，时常向她打听“接受捐赠的小朋友恢复得怎么样了”。

器官捐献协调员时常守在ICU病房门口，寄托着一群人生的希望，同时也要承受另一群人逝去的悲痛。

据了解，器官捐献协调员经历的案例中，多数是因为意外被送至ICU的病人，其中约三成来自交通事故。这些病人有的刚刚步入社会，风华正茂；有的在城里务工，是一家人的顶梁柱……

面对突然倒下的亲人，很多家属难以接受。这时，器官捐献协调员往往会静静陪伴在他们身边，有的男性协调员会主动递上一根烟。

“说得最多的话，应该就是‘嗯嗯嗯’。”郑冰莹说，认真倾听、陪伴安慰，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课。

待家属稍稍平复，郑冰莹会试探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态度。如果家属表现得异常决绝，毫无回旋余地，通常意味着任务失败。“但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尽可能传递生命价值延续的意义。”

郑冰莹知道，即使费尽心力，成功率通常也只有三成。“我们仍然会费尽心力，再小的光都可能带来无穷希望。”

“一个无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地方”

2018年以前，郑冰莹是一名心外科护士。

那时她对OPO的想象，是“一个没有夜班的地方”。然而入行才发现，这是“一个无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地方”。

在郑冰莹看来，24小时待机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常态——平日里，要关注全省各

地医院动向，一旦有潜在捐献者，便马不停蹄出发；捐献前夕，患者病情起伏不定，深夜赶到病房是常有的事；对于捐献者家属，也还有太多“医院之外的事”等着他们。

郑冰莹曾接触过一位河南籍病人的妻子。当时这位妻子刚从老家赶来，眼睛哭得红肿，面对因车祸离去的爱人和复杂的保险赔偿，女人六神无主。“我们协调员就带着家属各处奔波，找到保险公司、法医、交警等，为这个孱弱的家庭争取到合理赔偿。”

郑冰莹说，器官捐献者中不乏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。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，面对亲人离去的噩耗，有人会将初次谋面的协调员当成救命稻草。这时，协调员就要陪伴家属送好亲人最后一程。“帮助需要移植的人，更要帮助献爱心的人，这是我们的初衷。”

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OPO主任司晶在这一行工作了十年。

司晶曾遇到因丈夫意外身亡，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赶出来的女人。司晶记得，那几天，大家带着母子三人，到交通大队处理事故，到殡仪馆料理后事，最后每人掏了1000元房租，凑够半年房费，将这家人安顿下来。

“在逝者家属最无助时，我们唯有尽可能帮助他们处理各种善后事情，减少他们失去亲人的悲痛，也是对这些付出大爱的人的一种回报。”司晶说。

器官维护、后事料理、工伤认定、法律纠纷……每一个不幸的家庭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，这意味着在医学之外，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沟通技巧和法律、心理学等知识。

在孟超肝胆医院OPO成员万磊看来，“只有陪伴着家属，与他们共同经历困难、共同解决问题，才能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，他们才愿意把亲人身体的一部分托付给我们。”

器官捐献向阳而行

让郑冰莹深感欣慰的是社会认知的变化——人们愈发清晰认识到，生命可以以另

一种方式延续。

接手近千例器官捐献的司晶有一个感受：以前是穷苦人家捐献的多，现在随着社会进步、宣传普及，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也加入进来，社会整体觉悟在慢慢提高。

福建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敖志雄介绍，福建省器官捐献人数持续增加。2019年以前，福建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始终徘徊在数十例，2020年达到104例，2021年增长至164例。

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，2015年1月1日，全国逝世后器官捐献者累计2908人，志愿报名人数登记人数34049名。截至今年6月8日，我国已实现捐献人数超4万人，志愿登记人数477万人。

这也使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二位。

器官捐献事业向阳而行背后，是无数人的努力。

在福建，当地红十字会设立永生天使基金，为捐献器官的困难家庭提供补助，让“抱薪者”不寒于风雪；在安徽，当地设立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，每年冬至把捐献人的名字刻碑纪念……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生死，但呼吸、心跳停止，并不意味生命历程的终结。只有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所有痕迹消失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。”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OPO副主任王金山常用《寻梦环游记》探讨器官捐献的意义，“它将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长久的延续。”

谈到生命延续，郑冰莹常想起一位40多岁的父亲，他在独生子去世后选择捐献器官，一年后，在孩子去世的同一天，这个家庭迎来新的宝宝，仿佛“冥冥之中，命运不会亏待善意之人”。

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看来，生命难能可贵，生命又如薄潭冰，唯有爱心，能照亮死亡的永夜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吴剑锋 郭圻 实习生 叶国全